

書肆尋蹤

古旧书市场之旅

韦力著

中华书局



書肆尋蹤

古旧书市场之旅

韦力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肆寻踪:古旧书市场之旅/韦力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8.9
ISBN 978-7-101-13427-8

I.书… II.韦… III.古旧图书-书店-介绍-中国
IV.G23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1349号

书 名 书肆寻踪:古旧书市场之旅

著 者 韦 力

责任编辑 俞国林 潘素雅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9月北京第1版

201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20×1250毫米 1/32

印张13 字数266千字

印 数 1-15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427-8

定 价 78.00元

序 言

自古至今的爱书人都有一个通病，此病不是指爱书之好，乃是这些爱书人大多会以书为中心展延开来去热爱一些与书有关的人和事，而古旧书市场也就是得书的场所当然是藏书人的最爱之一。

孙从添关于藏书有“六难”之说，其中第一难为：“购求书籍，是最难事，亦最美事，最韵事，最乐事，知有此书而无力购求一难也。”没钱买书当然是爱书人的第一大头疼事，然细品孙从添的这段话，他却点出了藏书的真谛：收藏书籍虽然需要太多的条件和方法，但相比较而言，买书的过程才是最美之事。

既然得书能给爱书人以最高级别的愉悦，那书从哪里来呢？以我的看法，得书渠道大约可归为继承、购买、抄写三大类。当然如果把巧取豪夺也视之为得书渠道的话，那也可以将此四分。据传当年的丁日昌就是通过巧取豪夺的方式，得到了郁松年宜稼堂所藏的宋元旧本。这种说法出自陆心源，但后来的伦明和徐绍桢因为同为广东人，故纷纷撰文替丁氏辩污。而日本目录版本学家岛田翰在《硕宋楼藏书源流考》中则称：“心源因宋元本数种，而起猜猜曲成之辞，既伤友好，又欺后世。”

事情真伪如何，只能让专家们继续讨论下去了。但这段记载至少说明，巧取豪夺也是得书的方式之一。以这种方式得书，显然需

要太多的附加条件，比如有权有势、无道德等等。能有这种条件和金钱的人还能爱书，想想也不简单，但大多数爱书人不具备这样的先决条件，那只能祈盼其他的得书方式。

继承是大批得书的好方法之一，这也应当是每个爱书人的梦想，但能实现这个梦想的先决条件乃是祖上也有藏书之好，并且这些书能够迭经多年而留传到自己手中。书籍的性质最为脆弱，水火兵虫皆可令其损伤甚至毁灭。若赶上烧书运动，那更是书籍的灭顶之灾。如果某家祖上的一份珍藏能够躲过这么多的灾难而留传下来，那才是斯文之幸。如果到后世分财产时，其他的弟兄对此没有兴趣，而全归了某位爱书人，其狂喜之色简直难以行诸笔端。

能够有这种福分之人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的爱书人得书仍然靠辛苦买来。唐代杜暹曾言：“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看来，即使在遥远的唐代，靠薪水买书也同样不容易。难怪他跟儿孙们讲，卖掉我的书或者把这些书借给别人都是不孝的行为。而明代绍兴大藏书家祁承燦刻了一方章，其章文为：“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祁承燦也在强调得书之何等不易，虽然他不像杜暹那样把卖书和借书给人看视之为不孝，但他依然告诫子孙，自己得书是何等之不易，希望他们将自己的所藏保护下去。虽然爱书人的这种痴情基本上以事与愿违终结，但想想他们那时的心态，完全可以用其心可悯来形容。

古代没有复印机，遇到孤本或买不到的书，只好靠抄写来拥有，故抄书也是古代得书的方式之一。然而抄书也是一大笔费用，

无雄厚财力依然无法大量抄书。因此，通过买书来增加藏品依然是爱书人得书的主渠道。但买书也具有多样性：可以从私人手中买得，也可以去古旧书店选购，还可以像民国年间的一些大学者那样，坐在书斋中等书贾送书上门。

虽然得书渠道还有多样，但以我的经验，到书店去买书最慰我心，因为在店中选书之时，可以有意外之喜，而不像送书上门是对方来揣度得书人欲得哪些。书商虽然能够大约了解到相关爱书人的偏好，但他毕竟不是藏书者本人，无法真切地体味到藏书者在思维上的发散性。

转书店当然希望有许多店家聚在一起，那么多的书店毗邻而居，一家一家地看过去，且不论能够得到多少心仪之本，转书店的满足感就已无与伦比。当然，转书店的主要目的是得书，但并非每次转书店都有那么好的运气。徐志摩曾跟梁启超说：“得之我幸，失之我命。”这句话显然是文人语言上的达观，天下的百媚千红，谁不愿意将其通通揽入怀中，但方方面面的能力有限，故只能以“曾经我眼即我有”来作解嘲。

这就好比女人逛街，有时她们结伴而行，高高兴兴地在街上转个半天，虽一件衣物未得，但心情之愉悦却丝毫未减。当你问女士这个结果是否遗憾时，她们大多会回答你说：“看看也过瘾。”这句话用在爱书人转书街这件事上也同样适用，但是我不相信女人只逛不买和爱书人一本未得同样能心情愉悦。虽然结果貌似异曲同工，但爱书人转书街之时，哪怕未得心仪之本，他也会说服自己买一些并非急需的书，理由是：说不定哪天能用得着。这也正是爱书人对

书街最为钟情的原因之一。

若以书市的历史悠久论，应当以长安的槐市为最早。《三辅黄图》载：“仓之北，为槐市，列槐树数百行为队，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相与买卖。”在西汉时期，首都长安已经形成了书籍市场。故而，槐市应当是现有记载中最早的书街。两千年过去了，此处书街无迹可寻，而我找到的最早书街是位于北宋的都城开封。那里的书店街，虽然北宋时并无此名，但据文献记载，此街的位置大约就是北宋时期的书市所在地。

元代对藏书重视度不够，故其是否有书街，我未看到相应的文献。进入明代，图书的交易日渐繁盛。而到了清代，则进入了中国学术史的繁盛期。朴学的兴起，使读书人对历史典籍的需求量大为增加。尤其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使得琉璃厂的旧书业进入了鼎盛期，而在民国时期，旧书业依然延续了这样的繁荣状态。

近代因为海禁的开放，上海很快形成了一座超级大都市，旧书业也随之兴盛起来。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上海渐渐成为江南地区的古旧书流通中心，最终它与北京的琉璃厂并列为中国古旧书流通业的两大市场。

1949年后，随着相应政策的转变，古旧书业几起几落。到改革开放后，随着传统文化得以复兴，旧书业再度兴旺，而后又兴起了古籍善本的拍卖，使典籍的收藏更加深入人心。而各地古籍书店也参与其中，故中国古旧书业再入佳境，但北京和上海两大古旧书集散地的地位未曾撼动。

随着古旧书业的兴起，各地出现了不少的新兴旧书交易市场，而这些市场大多与其他门类的收藏品融合在一起。这种情况至今未曾改变，故很多爱书人都会到各地的古玩市场去淘书。

对于古旧书街的寻访，虽然我仅找到了本书中所列的数家，但却能够略窥当今古旧书市场的状况。而这样的寻访，仍然在进行之中，我还会继续探访下去，以便寻找到更多的古旧书街，呈现给爱书人。

韦力序于芷兰斋

2018年5月10日

目 录

序 言 / 1

昔日辉煌 云烟过眼

北京琉璃厂古旧书街 / 1

旱千厂甸 名家汇聚

北京报国寺书市 / 22

名冠宇内 善本难觅

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 / 34

起步较晚 影响居上

北京隆福寺古旧书街 / 57

天祥劝业 古街文庙

天津古旧书市 / 77

印售并重 中外交融

上海文化街 / 99

驰誉江南 善本难觅

上海文庙书市 / 122

书以类聚 友以群分

上海聚奇城古籍书刊交流中心 / 139

曾历旺市 难觅善籍

兰州古旧书市场 / 152

声名远播 古书罕觐

山西张兰古玩市场 / 170

大明湖畔 名泉四围

济南古旧书肆 / 192

北宋极盛 民国渐亡

开封大相国寺书肆 / 215

以此为名 天下仅有

开封书店街 / 231

万物齐聚 百纸皆藏

武汉收藏品市场 / 248

状元境内 夫子庙旁

南京古旧书肆 / 267

百年辉煌 终归消歇

苏州旧书肆 / 287

远溯唐宋 近盛民国

杭州古旧书肆 / 304

以楼证史 名宅为店

宁波鼓楼范宅古旧书街 / 326

接续建阳 盛极清中

浒湾书铺街 / 342

明珠之光 书香之地

香港西洋菜南街 / 364

兴于战后 没于光华

台北牯岭旧书街 / 378

昔日辉煌 云烟过眼

北京琉璃厂古旧书街

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力来说，近三百年来的中国古旧书市，北京的琉璃厂始终是这个行业的排头兵，这里曾经聚集着大量的旧书店，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古旧书店最集中的地方。

琉璃厂有多个名称，比如厂甸书市、海王村书市等等，指的都是同一个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名称呢？这当然还要从其历史聊起。

清乾隆三十五年，工部营缮司郎中孟澐在琉璃厂一带监督工人开挖土方。在施工过程中，从地下挖到了一个古墓，此墓颇为奇怪，因为里面没有棺材，但旁边有一块墓志铭，孟澐从上面看到了如下的字迹：

大辽故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司空、行太子左卫率府率、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李公，讳内贞……保宁十年（公元978年）六月一日薨于卢龙坊私第，享年八十。其年八月八日葬于京东燕下乡海王村。



东、西琉璃厂由这个天桥连在了一起

原来，这里葬的是一位辽代的官员。这件事被朝官钱大昕听到了，他立刻赶往现场，希望能将那块墓志铭拓下来，可惜他去晚了，等他赶到时，那块刻石已经不知所踪。好在孟澐在发现那块墓志铭时，已经让手下把上面的文字抄了下来。钱大昕读到这个抄本，由此而了解了许多的细节，而后他特意写了篇《记琉璃厂李公墓志》，此文首先讲述了这块墓志铭出土的经过：

乾隆庚寅三月，琉璃厂窑户掘土得古墓，棺槨不具而骨节异常人；旁有一石，视其文，则《辽故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司空、行太子左卫率府率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李公墓志铭》也。提督两窑厂工部郎中孟君澐募人改葬于故兆东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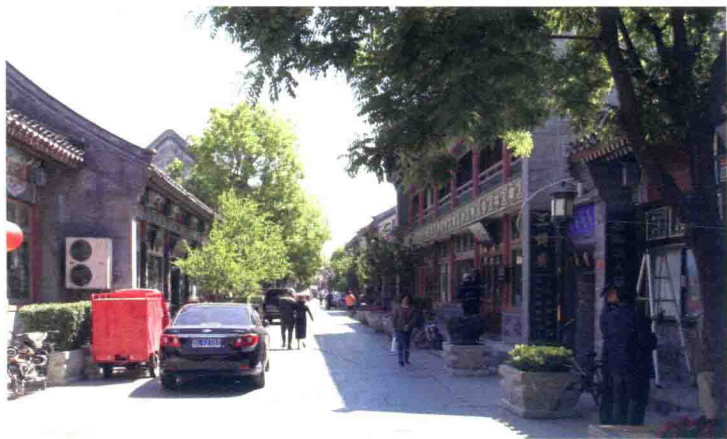
步，别买石书李公官位，表于道，而志石则仍瘞之。越十数日，予始得闻，亟往欲椎拓其文，不可得，世竟无拓本，惜哉！

看来，埋葬在这里的那位辽代官员李内贞也是位奇特的人物，他的骨节比平常人大得多，由此可以推断出他当年的容貌应该十分的魁梧，说不定长得也是奇形怪状。但重要的不是这些，最关键者则是墓志铭中的一句话：“保宁十年六月一日，薨于卢龙坊私第，年八十；以当年八月八日，葬于京东燕下乡海王村。”而后钱在《记琉璃厂李公墓志》的结尾处说道：“今之琉璃厂，在辽为城东燕下乡，正可互证；而海王村之名，亦好事者所当知也。”

看来，这块墓志铭的出土对海王村的历史追溯极有价值，由此让乾隆时代的人得知：原来琉璃厂在辽代时名称叫“海王村”。

“海王村”这个名称一直使用到了今天，这其中的缘由跟民国初年在此建立海王村公园有一定的关系。孙殿起在其所撰《琉璃厂小志》中说道：“民国六年，钱能训任内务部总长时，倡议在窑厂前面空地上，建筑海王村公园。园门内叠石作山，种植杨柳、月季、刺梅等杂卉，又高搭席棚，设置茶座待客。自公园成立后，曾将土地祠拆让一半，北至西河沿，南通南新华街，使厂甸四通八达，变成为琉璃厂之中心点。”

海王村到元代有了“琉璃厂”这个名称，元朝在此建造大都城，而海王村乃是在大都城与旧城之间。从元代开始，北京大兴土木将旧城改造为了首都。建造皇宫需要大量的建材，而琉璃瓦的烧制就在现在海王村的地方。张涵锐在《琉璃厂沿革考》中写道：“元



琉璃厂东街

代建都北京，名大都城。设窑四座，琉璃厂窑为其中之一。分厂在三家店，派士到西山采制琉璃瓦器之原料，由水路运至海王村之琉璃窑以备烧制。”

为了建造这个大都城，元朝在北京设置了四座琉璃厂窑，其中之一就处在海王村。这里的出产量应该极大，使得人们渐渐忘记了“海王村”这个名称，而改称这里为“琉璃厂”。当时制作琉璃瓦的原料主要是来自西山，但也有一部分则是就地取材，以至于将海王村这一带的土地挖成了很多的窑坑。看来当时不讲环保，对城乡接合部也没有整体规划，以至于这一带变成了大坑连连的破烂之地。但毕竟这里还生活着许多百姓，他们为了出行，就陆续在这些窑坑上建起了一些小桥，清李慈铭在《桃花圣解庵日记》中说道：“盖自明嘉靖以前，外城未筑时，此地有水，西流为清厂潭，又西南为

章家桥，又南为虎坊桥，又南为潘家河，而自厂桥南为梁家园，可引凉水河，处处经脉流通。”

看来琉璃厂一带曾经有很多的桥梁，这跟当地的水道发达也有很大的关系，因此这一带有不少的地名带有桥字。当然，最有名的就是“虎坊桥”了，直到今天，这个地名仍然在使用。而虎坊桥因为在琉璃厂旁边，所以“虎坊桥”这三个字也是北京古旧书市的代称。

琉璃厂还有一个名称叫“厂甸”，而今在四宝堂旁仍然有厂甸胡同存在，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写道：“厂甸在正阳门外二里许，古曰海王村，即今工部之琉璃厂也。街长二里许，麇肆林立，南北皆同。所售之物，以古玩、字画、纸张、书帖为正宗，乃文人鉴赏之所也。”由此可知，厂甸就是海王村，而海王村也就是琉璃厂。

一个旧书市场竟然有这么多的名称，而这些名称到今天仍然鲜活地使用在爱书人的口中和文字中，我不知道国外的情形如何，至少在中国的古旧书市场上，恐怕是他处无法相比者。

虽然海王村的历史追溯到了辽代，但这里形成著名的书市却是到了明、清时期，现在已知记载北京书市最早的文字，应当是明胡应麟在《少室山房集》中的一段话：

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



东琉璃厂入口的第一家店铺

庙极西，皆日中贸易所也。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

遗憾的是，胡应麟的这段记载没有提到“琉璃厂”或“海王村”这些字样。看来，在明代时，北京的书市主要集中在今天的天安门两侧。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天安门一带的书市没办多长时间就没有了声响，转而琉璃厂一带又出现了新的书市呢？这件事还要从满人占领北京谈起。

清顺治元年五月十一日，多尔袞下令将北京城内的汉族居民全部赶出内城，只允许他们居住在南城一带，腾出内城专让满族和八旗子弟来居住。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多尔